

理论信息

(第五期)

编辑：机关党委

2015年11月23日

目录

1. 皇帝的伙食费到底多少
2. 大清“裸官”庆亲王的作风问题
3. 雍正如何让官吏为国家做事
4. 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
5. “癸酉之变”与嘉庆帝的反思
6. “戏点到谁谁就唱”

皇帝的伙食费到底多少

一

皇帝的伙食费到底多少，皇帝并不清楚。

明朝万历皇帝月伙食开支 480 两白银，折合人民币 15 万元。清代小皇帝溥仪每年消费肉类 1 万斤、家禽 3 千只，一年要吃掉 20 万两银子！账本上这样写，皇帝们相信吗？

有的始终是冤大头。

有天早朝，乾隆帝好奇地问一个大臣：“你早点吃什么呀？”大臣答：“俺家里穷，吃几个鸡蛋凑合。”乾隆惊呼：“天哪，10 两银子一枚鸡蛋，你还哭穷！”

光绪最爱吃鸡蛋，但鸡蛋进价已攀升到每只 30 两银子，别的不算，就这一项年消费上万两。他和翁同龢探讨：“鸡蛋那样贵，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？”翁同龢只好编故事：“过年时候咬咬牙，买个把给孩子们解解馋。”可怜的光绪皇帝，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。

有的无可奈何。

道光皇帝感觉最近伙食费有点高，就想搞搞调研。有天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鏞：“外面鸡蛋多少钱一只？”曹振鏞情商超高，心想管后勤的咱可惹不起，巧妙回避了问题：“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，医生说只要吃鸡蛋就没命，真没口福啊！”

道光还想过叫外卖，可是没办法。

道光上任前，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美味汤面，念念不忘。登基后，他发现吃饭开支太大，就指示多搞点家事的，比如汤面。

内务府马上递上报告，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，修建汤面厨房一所，增加事业编制若干，拨付筹办费 6 万两，每年 1.5 万两保证运行。皇上一看差点晕过去：“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前门有一家汤面馆，好吃不贵，让人去买嘛！”

内务府旋即报告说，前门那家馆子早关张了。皇帝只好认栽：“算了算了，我不吃汤面了！”

有的下狠手整治。

咸丰皇帝书房坏了一扇门，后勤部门把门修好后，送上了报销单：白银 5 千两！咸丰帝大为震怒，下令组成专案组，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！

讯问结果是这样的：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，第一次给皇上服务心情太激动，把 50 两错填成 5 千两。

慈禧 60 大寿，光绪订做了一副银手镯作为生日礼物。经办人是内务府司局级干部庆宽，报销了 4 万两白银。光绪不傻：“怎么这么贵？”庆宽不软不硬地回答：“老佛爷昨天试戴了，直夸物有所值哦。”

庆宽通过私下运作，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全部政府采购工作，同事们眼红了，集体实名举报他的一堆问题。光绪乘机撤了庆宽一切职务，责令提前退休。

两个月后，经慈禧同意，庆宽得到了个更肥美的位子——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！光绪乖乖画圈，自此再不过问后勤的事。

有的狼狈为奸。

有一天，后勤部门出去采购了 100 只皮箱，每只报销 60 两银子。军机大臣阎敬铭悄悄报告慈禧：皮箱的市场价不超过 6 两，内务府报花账、骗领导！

慈禧脸一沉：“那好吧，给你半个月时间，你帮我买 100 只便宜箱子，办不到你负责。”

第二天，阎敬铭发现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。有人告诉他，昨天宫里来人通知，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，如有违反，没收营业执照。”

阎敬铭心想少跟我来这一套！奋笔疾书一封信，派人送给天津道台，请他赶紧代购 100 只皮箱送来。

半个月过去了，天津那边音讯全无，送信的没影了，急得阎敬铭差点撞墙。几年后他才知道，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一千两银子，让他滚得越远越好，不然小命不保。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：洪洞县里没好人！

二

内务府的干部是天生的坏蛋吗？如果政治上不可靠，品德有瑕疵，根本没机会来给皇帝管家。可是在清代，内务府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门，贪腐案件易发多发，谁都拿它没辙。同样一个人，怎么会由天使变成野兽呢？

原因很简单，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约制度，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，大家巴结还来不及，谁敢监督？内务府编制超过 3 千，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监督是不现实的。

“坏人”是坏制度惯出来的，“好人”是好制度制约、引导出来的；与其寄希望于发现“好人”，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。正如邓小平所说，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，甚至走向反面。”

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“向制度建设要长效，强化执纪监督”。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加强制度建设，最终实现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机制”，是深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。

大清“裸官”庆亲王的作风问题

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，名声也不太好，官运却好得出奇。自 1884 年到大清倒台的 27 年中，他先后负责外事、海军、财政等重要部门，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、内阁总理大臣，当然忙得要命。

但是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，忙啥呢？吃饭、打牌、投资。

请客和吃请是他每天必修课，主题多是庆贺生日。当时成功人士都是老婆一群、孩子一堆，所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，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。

然后就是打麻将。为了讨老佛爷喜欢，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，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，从宫女到太监，无不乐此不疲。

当时大清正是内外交困，慈禧需要舒解心情，所以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。

当然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庆亲王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，不是陪老佛爷、就是陪老佛爷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。这位女士每次进宫陪打，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。

有人实在看不下去，郑重提出批评意见。慈禧耐心地做人家思想工作：

“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？但是看来看去，还是他贴心。”

说庆亲王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，至少他的理财水平出类拔萃。

清朝中央政府官员工资并不高，要想理财，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。对此，监察机关直指庆亲王“细大不捐”，大钱不怕多，小钱不嫌少。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，明码标价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买卖好得很。

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 10 万两，立马买到了黑龙江代理巡抚。这样的事情多了，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：庆氏公司总经理！

英国《泰晤士报》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，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 712.5 万英镑——稍早，简·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，年薪 30 英镑，生活就比较体面了；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，不过 2000 英镑。

庆亲王理财很有天赋，也有超前意识。虽然外国银行已经进入中国，但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，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，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，更愿意到中国人的银行或钱庄存钱。

庆亲王却格外青睐外资银行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。要是迟生一百年，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、见首不见尾的“裸官”！

二

庆亲王的业余爱好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。

由于他的身体力行，当时北京的餐饮业、娱乐业十分发达。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，觥筹交错，灯红酒绿。洗牌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澡堂子、戏园子，茶楼、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，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。

倒霉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，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，照样每天忙于饭局、牌局，进出外资银行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梁士诒、那桐、曹汝霖等大人物，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。对此，连老外都忍不住了，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：庆亲王的所作所为，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。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仰天长叹：“锅里的水都烧开了，鱼竟然没感觉到！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日历已经翻到了1911年6月。

辛亥枪响6年后，庆亲王奕劻寿终正寝。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室这才明白过来，给他加的谥号是“密”，意思是“查找不足，认真整改”！无论对于庆亲王本人，还是对于清皇室，这个时候再来总结经验教训，显然没有任何意义。但是，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，庆亲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，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镜子。

雍正如何让官吏为国家做事

一

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，河南学政俞鸿图在主持乡试期间，违反规定把21岁的小妾带了过来。小姑娘对付老头子易如反掌，很快套取了试卷内容，然后让仆人出去找买主。一万多两银子轻松落袋，小妾得意极了，哪里想到这笔买卖是多么划不来。

一看平时根本不读书的“富二代”居然榜上有名，舆情汹涌，社会一片哗然，眼看要闹出群体性事件。雍正要求从重从快处理，给社会一个交代。刑部建议判处俞鸿图腰斩，雍正毫不犹豫地画了圈。

清代连上刑场也需要贿赂。因为是在办公室里直接被捕的，俞鸿图身上一文不名。刽子手拿不到好处，下刀一再“失误”，给犯人一个慢死。俞鸿图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，在地上连写了七个“惨”字。

没等主事官员报告完执行情况，雍正帝连连摆手：“别说了，别说了！”随即指示：以后轻易不用这种刑罚。据说俞鸿图是最后一名被执行腰斩的死刑犯。

科举是保证中国封建制度得以延续不变的压舱石，雍正帝对俞鸿图毫不手软，可谓执法无情。但腰斩是我国古代最野蛮、最不人道的一种刑罚，敢于废弃始自春秋时期的古老传统，显示出不忍之心，不能说他一味“嗜杀”吧。

许多德才兼具敢担当的干部，更能感受到雍正浓浓的人情味。比如在他们的报告上，他竟会这样批示：你最近身体好吗？好久不见，很是想念！等你完成任务回来，咱俩好好聚聚。

他关心干部的方式有时出人意料，至少看起来诚意多于权术。一天，某巡抚接到雍正帝的亲笔信，让他即刻回京商量大事。刚要动身，又一匹快马送来他的第二封信，说我找人给你算了一卦，你近日不宜远行，还是下个月再来吧。

爱屋及乌，雍正帝对干部家属也很关心。湖广总督杨宗仁重病卧床，雍正帝派御医赶赴武昌诊治，并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杨总督说，我儿子在陕西榆林

当道台，要是他能请假过来服侍我，那就太好了。皇上说，请假耽误他前程，不请假耽误你养病，不如调他到武昌当按察使，公私两便岂不更好？

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陈时夏升任江苏巡抚。80多岁的老娘一个人在云南老家生活，孝子陈时夏很不放心。雍正帝急令云南巡抚鄂尔泰：赶紧组织最好的轿子、轿夫，把陈老太太抬到苏州。什么时候出发，什么时候休息，什么时候吃饭，都听老人家的。安全第一，不赶时间。

同样是关心干部家属，有时候雍正帝又会由柔变刚，前后判若两人。孙国玺新任台湾道台，由于这个岗位不允许带家属，他只得把老母亲留在海峡此岸。雍正帝严厉批评吏部工作不细，又发一文，调孙国玺到福州工作。

过了几年，老妈要过80大寿了。孙国玺觉得跟皇上关系不错，便请求恩赐匾额，给予诰封。皇上拍了桌子：“你还有脸开口？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，以为我不知道？老太太就要被你这浑球连累了，你还装孝顺，等着查处吧！”

有趣的是，雍正皇帝有时在工作中突然冒出的几分孩子气，让人忍俊不禁，也让人深思。

新君上任，正需要立威。翰林院的孙嘉淦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批评皇上跟亲兄弟搞不好团结。在争取接班地位过程中，兄弟之间免不了恩恩怨怨，康熙皇帝晚年疾病缠身，60多岁就走了，就是被这事气的。这个家丑不但涉及前后两代皇帝的高大形象，还关乎体制问题，成熟一点儿的干部都会绕着走。

果然，雍正皇帝脸都气白了，逼问翰林院：“一个从七品毛孩子敢这样狂妄，真是找死的节奏啊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你们不处理我处理！”

正在紧急关头，太子的家庭教师、吏部尚书朱轼咳嗽了一声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这小子确实狂妄，一定要严肃处理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很佩服他的胆量，有点儿魏征的影子呢！”

雍正毕竟是雍正，愣了一下，红着脸赶紧给自己找台阶下：“嘿嘿，我跟朱老师一样，我也佩服小孙的胆量。”接着，把孙嘉淦越级提拔到司局级。

这件事还刺激雍正开动脑筋，创设了秘密立储的皇位继承制度，从根本上解决了兄弟“团结”的问题，意义深远。自从皇帝把接班人名单塞到“正大光明”匾牌后，皇子们只管正大光明地做好工作就是了，再也不用斗智斗勇斗狠了。爱新觉罗家的统治能再延续近 200 年，与这项充满智慧的制度设计有关。

有多大抱负就有多大度量，有多大度量就有多大成就。雍正皇帝的博大胸怀和用人导向，是雍正新政的重要特点，不但吸引了天下英雄为知己者死，并且影响到他身后，为辉煌的乾隆时代储备了大量值得信赖的干部。

除了这些“花絮”，“摊丁入亩”之类涉及民生的重大改革，无论他是什么目的，客观上毫无疑问是德政、仁政。

清代原有的人头税制度十分荒唐，不管老百姓家里有没有土地，一律按人头交税，乞丐与富豪平等，穷人生不如死。实行“摊丁入亩”之后，土地多的多交，土地少的少交，没土地的不交，不知给多少穷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锁，铲除了多少官员的摇钱树。对地主老财和贪官来说，这当然是“严苛”！

二

事实上，双管齐下正是雍正治吏的基本特点。

一方面，对腐败的贪官、混日子的懒官、只会拍马屁的巧官出手很重，始终保持高压，尽管人治色彩浓厚，但是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已属不易，岂能求全责备。

另一方面，对待忠臣、清官、能人，雍正帝无不春风满面，呵护有加。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雍正皇帝，一枚双面的硬币。

雍正帝的严厉和温情是有原则、有主题的：他要打造一支铁的队伍，服务于改造中国的大棋局。他自己说得明白：就是为了让大家真心实意为国家做事。

雍正皇帝成功了。他和他的团队仅用康熙、乾隆执政的十分之一的的时间，创造了许多奇迹，把中国古代文明推向了极致：“雍正一朝，无官不清”；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；康乾盛世的框架结构基本完工！

那真是史上少见的革故鼎新、改天换地的时代，也是一个风云际会、大浪淘沙的时代，每个人都面临抉择。——我现在突发奇想：如果能穿越回到 300 年前，我是雍正手下的一名干部，我会如何抉择呢？

理想决定立场，立场决定思想。如果我站在苍生社稷、修齐治平的大格局上看雍正，自会紧跟时代步伐，不待扬鞭自奋蹄；如果我满脑子是升官发财当老爷的封建糟粕，一定感到度日如年，抱怨“官不聊生”、“舒适度”没了。内心一有抵触，自然想方设法逃避、抵制、糊弄、贪腐，巴不得一切赶紧过去。

思想决定行为，格局决定结局。如果我选择前者，最终必然炼成亮闪闪的真金，人生的价值便厚重起来。如果我选择了后者，我就是一粒无足轻重的沙子，被时代的洪流冲得不知所终。

没有第三种结果。

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

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，否则一切免谈。贪能误国，懒也误国。作风上正派廉洁，工作上敢于担当，二者缺一不可。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。

考核县太爷

清朝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，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闻。1724年又是考核年，上任不到两年的新君雍正，对一个县官的处理不同以往，让各级干部吃了一惊。

此人名叫常三乐，是直隶吴桥县令，负责考核他的是直隶巡抚李维钧。

李维钧给常三乐写了两条考核评语，一是“操守廉洁”，是个清官；二是“懦弱不振”，工作积极性不高。据此，他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，因为教书育人对操守要求高，工作量却不大。

吏部向李维钧提了一个问题：你说老常工作不胜任，到底有什么具体表现，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？

李维钧举不出像样的例子。

吏部说，既然没发现实质性问题，提醒提醒算了。

李维钧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，吏部只好去请示领导。

雍正帝看了报告，朱笔一挥：撤职！理由很简单，县域是社稷基石，县令责任重大，常三乐责任心不强，本身就是失职渎职，还要等着出大事吗？

其实常三乐真该偷着乐。山东曹县盗贼猖獗，老百姓惊恐不堪，县令王锡玠置若罔闻，结果被皇上摘掉乌纱，判了5年徒刑。正二品的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，为人老实本分，但作风拖拉，工作没招数，部队根本不能打仗，雍正帝勒令其马上回家种地。

这样，就有人开始怀念康熙朝后期那些年，当时官员们真是太爽了，就像晚清的李鸿章所说，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，真是太笨了！

那时，皇上脑血栓比较严重，对人对事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常说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官场的贪、懒蔚然成风，通不过考核的很少，被严肃处理得更少。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往往罚俸了事，干部经济上吃点亏，政治前途不受影响。

眼看雍正帝的治吏新政如此严厉，各级官员在震惊之余，终于回过味来：看来，官是不好当了！不但要两手干净，这双手还必须干活呢。

开始，不少人思想不到位。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：为报答皇上厚爱，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，两袖清风。雍正帝不以为然，批示道：当官本来就不该贪，这算什么高标准？如果只满足于“清官”的好名声，却倒了油瓶不扶，不就是绣花枕头吗？

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，否则一切免谈。贪能误国，懒也误国，无所作为的“清官”就是庸官，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，都不是好官。作风上正派廉洁，工作上敢于担当，二者缺一不可。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。

改变观念谈何容易。无官不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，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官员评价标准：只要不贪腐就是“好官”，至于这“好官”有什么贡献，倒没人在意。

提拔工勤员

1728年元宵夜，内阁办公室的小蓝正在顶班，忽然进来一位高个子中年人，一定是出来散步的内廷值班员。两人边喝茶边侃大山。

高个子问，你是什么官？小蓝不好意思地说，不是官，小小工勤员，收收发发，抄抄写写，给领导沏沏茶。高个子问：其他人呢？小蓝回答，都回家看灯去了。高个子很好奇：你不喜欢看灯吗？小蓝说，当今皇上励精图治，听说晚上都不睡觉，万一有个急件，没人跑腿要误大事的！

高个子点点头，又问小蓝将来有什么打算。小蓝说，假如天上掉馅饼，能到渔船管理所工作就好了。我家孩子多，这样就是闹饥荒也饿不死。高个子哈哈一笑，告辞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雍正就问：哪个渔船管理所有空缺？下面说广东南海县有。雍正说，让内阁的小蓝去吧。大臣们面面相觑：小蓝是谁？

只要正派能干，雍正都会重用，哪怕有不同看法。

田文镜主政河南、山东的时候，配合雍正新政，整顿官风，打击贪腐，就连中央干部到地方揩油，他也敢向皇上报告，得罪了不少人。雍正把他树为模范总督，号召高级干部向他学习。

户部向各省要钱扩充小金库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，只是没人敢点破。中层干部李卫多次向一把手提意见，人家就是不理。李卫就弄来一只柜子，写上“尚书专用钱柜”字样，放在衙门口羞辱领导。

当时雍正还是雍亲王，他记住了李卫的名字。当皇帝后，几乎年年提拔李卫，李卫也不含糊，工作大刀阔斧，政绩斐然。

但是李卫为人粗粗拉拉，比如直呼领导“老张”、“老李”，工作方法也简单，对他的举报就没断过。雍正做大家的思想工作：你们要不服气，给我推荐个又能干又温柔的完人吧？

两个翅膀才能飞

有其臣必有其君，雍正帝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、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。

他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，只有过生日那天才给自己放天假。现存档案表明，他光在奏折上就批了1000多万字，是全部《资治通鉴》字数的三倍还多。

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创造了一个盛世神话，最后也留下了一堆乱麻：吏治腐败、效率低下、国库空虚。早在当藩王时，雍正就深为忧虑。

雍正上任后，既不容忍“贪”，又不容忍“懒”，两手抓，两手硬。他首先诛杀贪官，保持高压，让官员们听到“钱”字就发抖。在对贪官执行死刑时，常组织官员到场观摩，他认为现场警示教育，比让官员学习《论语》管用得多。

与此同时，雍正奖掖勤能、责罚庸懒，逼迫官员改变作风，不换脑筋就换人。大家如梦初醒，意识到不是现在官不好当了，而是过去当官太容易了；谁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，就是跟自己过不去。

官场风气迅速扭转，号称“雍正一朝，无官不清”，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。创设军机处，集中权力推进改革；取消人头税，缓解社会矛盾；改土归流，维护国家统一等大手笔，如果没有肃贪治懒的铺垫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
康熙末年，国库存银仅 3200 多万两，到雍正七年接近翻番。日本的华裔学者杨启樵感叹道：“康熙宽大，乾隆疏阔，要不是雍正的整饬，清朝恐早衰亡”！

康乾盛世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巅峰，雍正承前启后，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人物，所以“康乾盛世”又称“康雍乾盛世”。

然而，康熙登基早，乾隆寿命长，两人执政时间加起来长达 124 年之久，而夹在中间的雍正时代，只有短短的 12 年 8 个月。考虑到这个事实，人们对雍正和他的执政团队不能不肃然起敬！

“癸酉之变”与嘉庆帝的反思

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

一

一想起 1813 年秋天那件事，嘉庆皇帝就感到窝囊：他差一点儿就当了大清的末代君主，并且，各级官员早就知道要出事，却都像请客一样，把问题迎进了紫禁城。

1812 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，台湾知府汪楠，被淡水同知查廷华扰了美梦。

原来，查廷华他们抓了一个传教的人，此人不吃打，供出了一个惊人情报：明年中秋节，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，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，建立新王朝。头子叫林清，突击队长名叫祝现……

汪楠稍作思考说：

“犯人为了保命，什么胡话都会说。你知道谎报的后果吗？快把那家伙宰了，免得出去瞎说，给我们惹事。”

1813 年初夏的一天，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有事请假，祝现的堂弟祝富庆偷偷来访，一是举报自己的堂兄谋反，二是举报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，其实是在打造枪械。

毕竟是皇室宗亲，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：

“有这事？我这就进宫禀报！”

仆人备好了轿子，豫亲王却摆了摆手，沉吟半晌，低声劝导举报人：

“做事要动脑子啊！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，你想害整个祝氏家族吗？此事到此为止，千万别再提了。”

8 月以来，京城卫戍司令吉伦将军连续接报，说天理教徒很快就要攻打皇宫。吉伦十分淡定：

“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，我操这个闲心干啥？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，加强巡逻就是了。”

9月底，嘉庆帝结束休假，离开木兰围场回京，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。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，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。

刚上路，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，气喘吁吁地报告：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天理教徒混进城了，请大人即刻处理！

吉伦火了：

“你们有完没完？想立功受奖想疯了？滚开滚开！”

参谋不依不饶，一把拽住吉伦的马缰绳，苦苦哀求：“大人……大人！您真的不能走啊，要出大事啊！”

吉伦大为恼火：

“我大清正是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，天下归心，你竟敢造谣惑众，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你！”说罢，一脚踢翻可怜的参谋，拨马呼啸而去。

10月7日中午，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锬之，正与客人觥筹交错。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破门而入，附耳低语：昨夜、今晨，家住宋家庄的林清等人，骗过岗哨，经卢沟桥进了城，明天午后攻打皇宫，情况十万火急！

刘锬之早已进入酒酣耳热状态，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幼稚、幼稚！你以为吉伦大人的部队是聋子的耳朵？皇帝老子家是大栅栏，谁想进就能进？别没事找事了，陪我喝酒。”

第二天，1813年10月8日下午3时整，天理教徒200余人装扮成卖柿子的、送货的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由东华门、西华门攻入皇宫。两天一夜之间，皇帝家中刀光剑影，箭矢乱飞。警卫部队惊慌失措，死伤过百，假如外援及时跟进，林清他们肯定会把大清皇宫连锅端！

凑巧，嘉庆帝的二儿子，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，平时最爱摆弄冷兵器时代最吓人的玩意儿——火枪，这次派上了用场。几声枪响，竟然稳住了军心，逆转了形势。在禁军的围剿下，天理教徒寡不敌众，起义失败。

而远在河南滑县的另一支天理教队伍，稍早前已经起义，剑指北京。清政府用尽九牛二虎之力，耗时三个月，才勉强平息事态。

这件事发生于夏历癸酉年，史称“癸酉之变”，是清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，是大清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不祥之兆。

二

“从来未有事，竟出大清朝！”嘉庆皇帝如此表达了他的震惊和愤懑。他发明了“因循疲玩”这个新词，指责汪楠等人不负责任，言下之意，如果他们干活稍微认真点儿，灾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，至少不会闹这么大。

嘉庆皇帝想错了。触发癸酉之变的，不单是个别人的工作作风问题，而是整个官场出了问题。

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：官员们除了“贪”，还特别“懒”，没人想做事，讨厌担责任，整天无精打采，敷衍了事。从乾隆中期开始，官场就如一潭死水，不作为是主旋律，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，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。

人人麻木不仁，个个“炸雷都打不醒”，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：升官发财！目标明确了，办法就有了。

一是不犯错误才能升官。“多磕头，少说话！”三朝元老曹振鏞的名言，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：做事越多，错误越多，不干活最保险。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，踢皮球，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。汪楠杀人灭口，无非是怕给自己惹麻烦。

白莲教起义失败后，林清等人利用大饥荒，在华北农村轰轰烈烈地传播天理教。早在起事八年前，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宫、再取全国的奇特战略。“要想白面贱，除非林清坐大殿”，如此直白的民谣家喻户晓，而在中国历史上，民谣一贯

具有政治风向标的意义。林清完全没有保密意识，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社会上是尽人皆知。对此，官员们个个睁一眼闭一眼，假装不知道。

二是上司满意才能升官。在清朝官场，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。天大的事吉伦都不用心，唯独接驾很积极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把“唯上”发挥到了极致的，是咸丰帝的军机大臣王文韶，人称“溜溜球”。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，他的听力就急剧下降；事情如果足够大，干脆就彻底聋了。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。

对于躲不掉、踢不走的皮球，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，一旦领导追究起来，比较好解释。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“加强巡逻”，显然是做样子、走形式。

某天，嘉庆皇帝咨询刘墉：“你看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？”刘墉支支吾吾了老半天，末了就挤出两个字：“尚可。”嘉庆帝苦笑说：这么大的官也在混日子，工作根本不用心，怎么得了！

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，真是又安全、又省劲；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，上司还高兴，何乐而不为？

三是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。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？头年去京南游玩，他通过祝现认识了林清，受到热情接待，酒喝多了，就住林家大院了，临走还没少拿。要是皇上知道了，一切都完了！于是，国家利益自然让位给个人利益。对这种现象，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：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。

同豫亲王一样，在洪秀全起义之初，地方官也是使劲捂盖子，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。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，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。

魏源这样概括大清官场风气：“不承担责任是成熟稳重，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，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！”至于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传统价值观，谁信谁弱智。

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，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，灾祸接踵而至，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：第一次鸦片战争，英国军队

只有 4000 人，根本没打算赢；太平军成气候，源于地方官帮忙；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，却迎来甲午惨败；北京守城正规军达 15 万之众，被不到二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；甚至连辛亥革命枪响，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……

完全可以说，早在癸酉之变时期，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；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——费正清找到了原因：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！

三

癸酉之变已经过去 200 年了。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，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，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。

王岐山同志指出：“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。”（来源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新闻报道《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王岐山瞻仰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》——编者注）

无论是政权性质，还是立国宗旨，清朝与共产党没有可比性。但是，任何政权的正常运转和执政目标的实现，都有赖于广大公务人员的动员组织；公务人员的思想境界、精神状态和工作能力、工作作风，直接影响施政质量和效果，关系政权的兴衰成败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进行了两大意义深远的战略部署，深得党心民心：一是绘制了中国梦的绚丽蓝图，制定了改革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；二是开展作风建设大扫除，正风肃纪，扶正祛邪。

这两大战略部署齐头并进，蕴含了严密的逻辑联系、深远的战略意图。

优良作风是事业成功的保证，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。当年，无论是斯诺、史沫特莱，还是陈嘉庚、黄炎培，在目睹了根据地军民的勃勃生气后，一致认定“延安作风”必胜，“西安作风”必败，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。90 多年来，我们党始终把党的作风视作生命，把不良作风视为大敌，终于由小变大，由弱变强，成为历史前进的引领者。这是何等宝贵的政治经验和精神财富！

作风是一个变量，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，不但要始终不渝地坚持，必要时还须下猛药。在党带领人民开始新的长征的关键时刻，“四大考验”和“四大危险”横亘在我们的面前。只有牢记理想宗旨，心系国家人民，彻底扫除作风上的污垢，才能精神饱满、意气风发，延续昨日的光荣。

为此，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，以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发端，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跟进，定点清除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，触动和净化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，干部作风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，人民群众坚决拥护。

作风体现党的性质，代表党的形象，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，最终决定我们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。新一届党中央开展的，就是这样一项意义深远的伟大工程，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，将会浓墨重彩地记录这一页！

历史终将证明，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总是与人民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，一切为了人民，全无一己之私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，完成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，也开辟了长期执政的成功道路。

“戏点到谁谁就唱”

读一本好书，如邂逅多年不见的老友，《黄克诚自述》就是这样的书。他回忆的许多陈年旧事，看似不经意，嚼一嚼却韵味无穷。

1938年夏天，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职位出现空缺。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骁勇善战，又是红军老战士，正在驻地检查工作的朱德让田守尧先代理，报请总部正式任命。但是，延安方面否决了这个提议。旅政委兼党委书记黄克诚怕田守尧想不通，建议朱总司令再跟中央说一说。谁知朱德总司令却说：“这有什么关系！戏点到谁谁就唱，共产党员嘛！”

新任旅长杨得志到任，田守尧不参加欢迎会。朱德要求马上召开党委会，同志们对田守尧的批评帮助毫不留情。散会前，朱德又重复了那句话，“戏点到谁谁就唱，没点到你就不能上台，共产党员嘛！”朱总司令的话让田守尧幡然悔悟，他凡事从严要求自己，后来成为我军一颗耀眼将星。

“戏点到谁谁就唱”，党内规矩高于一切，干部服从组织天经地义，所以朱德才能对人事问题举重若轻，田守尧才会服膺党组织的批评。不禁想起我认识的一位老同志。1956年被组织从上海调到西藏工作，他让爱人留下来照顾老小，夫妻从30多岁分居到60多岁，其间偶尔回乡探亲，子女竟不认他。我曾问他，家里那么困难，不能请求组织换个人吗？老人家看了我一眼，严肃地说：没这规矩！

守纪律、讲规矩，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。党性不仅印在党章上，更铭刻在全体党员的心中，体现在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和规矩不打折扣地遵守、积极主动地执行上。在那物质贫瘠、烽火连天的年代里，党内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尚如此浓厚，如今风险挑战更多了，物质诱惑也更多了，守纪律讲规矩更加不能含糊。

过去有一段时间，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明显。许多干部为非分之想向组织伸手，不满意组织安排就讨价还价，本人理直气壮，领导无可奈何，大家习以为常。纪律和规矩软化了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生锈了，党内政治生活便不成体统，这样温湿的环境自然容易滋生不良作风和腐败问题。我曾问一位犯了错误的同

志，为什么十八大之后还不收手，他说的话发人深省：过去文件不是没有，要求不是不高，都是传达一下就完了，这回来真的就不适应了。

从出台八项规定、狠刹不正之风，到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利器、修复党内政治生态，从强化“两个责任”、落实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，到唤起党章意识、修订党内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纪律和规矩的红线绷紧起来、管用起来。对党员干部而言，纪律和规矩，在不想遵守、不愿遵守的人眼中是一种约束、一种限制，在心中有规矩、心中有纪律的人那里，则是一种责任、一种境界。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，做得好算不上壮举，做不好则是逃避责任。

一个目无法纪的人成不了材，一个软散如泥的组织也难以成事。只有当纪律和规矩成为人人高悬心中的律令，进而成为人们的一种潜意识和自觉修为，严肃认真、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生活秩序才能建树起来，我们也才能更加从容地走向未来。

（注：1943年，新四军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，在与日寇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，牺牲时他年仅28岁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，一位骁勇的战将，一颗早陨的将星。）